

6-756-7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一百二十二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编辑部 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目 录

我的戎马生涯 李 觉(1)

求学时代——从军初期——十年歧途——八年抗战——起义前后

两广事变

蒋介石企图利用我倒陈济棠的一幕 林 虎(23)

何键在两广事变中玩弄两面手法 罗子雯(28)

人物述林

追忆先父宋哲元将军 宋景昭(35)

忆旧谈往

创办汤池训练班的前前后后 杨显东(50)

张学良三次派我去陕北红区 周相臣(63)

民盟史料

四川民盟策动川康军政人员起义概述 张松涛(66)

经济史料

雪泥杂记

——我的创业生涯 章剑慧(90)

无锡老家——初出茅庐——荣氏兄弟——迁厂奇
迹——创办了各项企业——西北建厂——接收日
本纺织厂——彷徨和抉择

回忆《中国实业志》编纂经过 冯和法(106)

艺术史谭

永不反悔的路 张 权(110)

童年的歌——启蒙者——流亡学生——留学生涯
——黄金岁月——噩梦——难忘哈尔滨十七年
——也许是多余的话

齐派艺术的传人——娄师白 邹士方 秦宝春(131)

“抓周”时他抓了毛笔——听“封箱戏”——巧遇名
师——正式拜门——言传身教师徒情——改名
——“老师健在,我决不出名卖画”——创新——
足迹遍及海内外——《齐白石绘画艺术》出版

旧案重提

关于光绪之死 察存者(145)

狱中奇遇

——与金树仁谈金树仁案 濮清泉(151)

漠北纪游 封鹤君(170)

补充·订正·质疑

我亲身经历的“三·一八”惨案实况

——订正楚溪春《“三·一八”惨案亲历记》中的

几处谬误 杨春洲(179)

我的戎马生涯

李 觉

李觉，湖南长沙人。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，后投唐生智，曾参加北伐战争。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对日作战，屡立战功。历任国民党高级将领。1949 年与程潜、陈明仁等于湖南起义。新中国建立后，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，全国政协第二、三、四届委员，第五、六届政协常委。

我姓李名觉，号云波，在家时又名淑志。湖南长沙人。祖父母去世早，无叔伯。父亲因家境艰难，读书不成，改为经商，流寓云南一带。我母亲是云南景谷县人，共生一女三男，我是最小的一个。我生于 1900 年旧历五月初十。当时，正值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，景谷县接近英属缅甸，父亲为安全起见，护送我们母子回到家乡长沙。在城里购置一所房子，在乡下买得水田 15 亩。安置妥贴后，第二年父亲又去云南继续经商，不久即病死在昆明。当时，我只两岁，最大的是姐姐，也只 9 岁。母子们无依无靠，幸亏家有薄产维持。母亲勤劳节俭，生活严肃，具有极端忍苦耐劳的倔强性格，又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妇女。母亲这些可贵的品质深深影响了我，使我从小养成老实诚恳，不畏艰难的好品德。母亲为了教子成名，光宗耀祖，千方百计让我们兄弟读书。两个哥哥学工科，而我则经历了曲折的求学道路。

求学时代

1906年,我入县立初小读书。当时已经废除了科举,创立了新学,学堂不收学费,但还是要拜孔夫子。

我10岁那年,进入县立高等小学,每年仍要参加祀孔和祭天的典礼。这些旧的教育,使我更加习惯于循规蹈矩,守礼奉法。第二年,辛亥革命爆发,我才11岁,谈不上受到多少革命影响,但社会动荡使学业荒废了。至1912年高小毕业时,我有好几门功课不及格。母亲非常着急,节衣缩食,为我聘请良师在家补习了一年,两位学工科的哥哥也利用假日为我补习功课。

1913年我终于考取了长沙修业中学,一读又是3年。由于小学基础没有打好,中学课程又十分繁重,我对读书越来越不感兴趣了。正好这时北京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招生,我请邻居的一位军官帮忙,竟然考上了这个学校。

1916年,我第一次离开母亲到千里之遥的北京入学。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和兴奋。学习不到半年,到1917年7月张勋复辟,京城大乱,无法上课。停学半年,局势平稳后,重新入学。两年后,爆发了五四运动,同学们纷纷卷入其中,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我当然也不例外。北洋军阀政府不许学生“闹事”,派了一连士兵来“保护”学校,不准外出集会,不准看报会客,接电话都有限制……这样变相地把师生们关了一个多月后,又决定提前放假,各自回家,到下半年才复学。这次爱国运动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,第一次懂得了“爱国光荣,卖国可耻”,懂得了民主和科学救中国的道理。

1919年底,我在这所军校毕业,被分配到山东省境边防军第二师当入伍生。这是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的一支新军,全是日本装备,并有日本军事教官负责上课。但我们这批经过了“五四”洗礼的入伍生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主精神,因此常常与日

本教官的霸道行为发生龃龉,激起纠纷。连我这老实人也常常受到他们的责罚,使我很不安心在此服役。半年后,发生了直皖战争,段祺瑞战败倒台,这支新军也就解散了。于是,我和十几位湘籍同学决定回湖南,回到革命气氛较浓的南方家乡去参加革命队伍,免得受外国人和北方人的窝囊气。

从 军 初 期

1920年11月,湖南已由赵恒惕取代谭延闿担任省督军兼总司令。他倡导与四川等省搞联省自治,并对湘军实行整编。我回到长沙后,即和同学们去找当时湘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团长沙生智,说:“唐团长,我们已找到一份工作,每月津贴大洋10元,请您帮忙作个转荐。”唐生智听后,半天没做声,最后才说:“良相出自州牧,猛将来自行伍。想带兵的人,要先到士兵当中去磨炼,不要只顾浮在上面多赚钱。”于是,将我们分到一个营去当排长。

这个营是新从嘉禾收编过来的土匪部队,士兵毫无纪律可言,生活作风也非常腐败,是当时唐团中唯一的一支烂部队;全靠营长周至柔(湖南郴州人,保定二期毕业)和几个从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排长在里面撑持着,骨干力量显然不够。唐生智将我们分配进去,是抱着很大期望的。但我们当时都只十八九岁的青年。“嘴上无毛,办事不牢”,士兵们认为我们这些当官长的人没有胡子,是没有足以震慑部队的威风煞气的。因此,讲话无人听,做事无人帮,使我感到非常苦恼。唐生智总是宽慰我们,鼓励我们,说:“你们把老姜烧热了去烫嘴唇,可以烫出胡子来的。不信,你们试试看。”同学都知道这是句玩笑话,但我信以为真,老老实实地去试了一试。结果,当然什么也没有烫出来。幸亏几个老排长是云南籍人,我也算有半个云南籍,同事加同乡,自然好相处。我当时牢记唐生智要我们去士兵中磨炼的训话,不怕吃苦,不摆架子,经常和老排长们一起与士兵们玩游戏,作劳役。那些土匪出身的士兵,虽然言语粗

俗,动作野蛮,但都很识好歹,很讲义气,因此很快就信服了我们,还亲切地叫我“小排长”。行军打仗时处处照顾我、保护我。

1921年夏,湖北发生宣武兵变。鄂省国民党党员李书城、蒋作宾等与鄂军师长夏斗寅密谋驱逐湖北督军王占元,怂恿赵恒惕联合四川刘湘共组“援鄂军”,约定事成之后设三省联省自治政府于长沙。6月,赵恒惕调齐各路湘军北进至岳州羊楼司,王占元宣布下野^①。但驻节洛阳的吴佩孚却荐肖耀南为鄂督,并派四艘兵舰,由水路进攻岳州,大败赵军。当时,唐生智已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,率兵冲在最前面,我也随在其中。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激烈的战斗,心中未免有些畏怯。但看到唐生智总是以身作则,进攻在前,退却在后,深受感染,也自动请求和唐生智一同断后。唐问我:“怕不怕?”我说:“旅长不怕,我怕什么?”唐生智点头赞许,此后对我十分器重。这年10月,即派我到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去深造;但读了三个月后,直奉又发生战争,学校又解散,我又回到唐旅长第三团第八连当连长。一个月之后,局势平稳,我才又去保定带职复学。

1922年5月,我在保定军校毕业,回原部队继续担任连长。该团团长是刘兴,他具有极端严谨、一丝不苟的军人特性,平日腰杆挺直,一点不弯;对内务整理绝不马虎;打起仗来也和唐生智一样,身先士卒,非常勇猛。这一切,都对我产生极好的影响。

这时,何键在唐部担任骑兵团团长。他原先也只是谭延闿部下一名排长,吴佩孚南进占领省城后,赵恒惕派他回醴陵老家打游击。他由一支九响枪起家,和张国威一起,从北洋军手中夺枪扩军,到1919年已发展成拥有一千多人枪的队伍。时任湘军总司令的程潜招他为旅长,后因程潜下台,而被唐生智收编为骑兵团营长。此后,他随唐生智作战,屡有战功,得升团长、旅长。他有五个女儿,大女儿何玫秀外慧中,颇有见地,立志要嫁一个老实忠厚的

^① 据《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》记载,王占元于1921年8月免职。

年青军官。于是由唐生智作伐,我和何玫订立了婚约。1923年夏我和何玫在长沙结婚。婚后不久,谭赵战争又起。这年7月,谭延闿在广东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为号召,组织“讨贼军”,赵恒惕则以维护联省自治的省宪为名,组织“护宪军”。两军相峙,赵恒惕一面派叶开鑫抵御湘南谭军,一面派唐生智、贺耀组对湘西蔡钜猷军发起攻击。开始时,赵部一师师长宋鹤庚、二师师长鲁涤平以及旅长吴俭学、谢国光等均纷纷附谭倒赵,声势浩大,赵督岌岌可危。幸唐生智挺身而出,在打败蔡钜猷后,又与叶开鑫、贺耀组等一起奋力作战,将谭军及宋、鲁、吴、谢等部一古脑儿赶出了湘南,赶到了广东。这时我还在刘兴部下,不恋新婚燕尔,奋勇当先,立下了战功,被擢升为第二旅第十四团二营营长。

1924年,唐生智被赵恒惕任命为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,驻衡阳。唐实力不断壮大,所部扩充到四个旅,十五个团,达五万人枪;以刘兴、李品仙、何键和周斓分任第二、八、九旅及警备旅旅长,成为湘军中最具有战斗力的队伍。这一年,我被调到第九旅第二十七团三营当营长,从此归属到何键部下。同年秋天,赵调第四师到广西支援陆荣廷打内战。唐生智对此不感兴趣,只派了我等少数几个营的兵力,到全州附近的黄沙河,将被李宗仁等打败了的陆荣廷接到永州,即算完成使命,不再深入桂境。

1925年,第四师的官兵在唐生智亲自倡导下,全部加入了佛教,实行“五戒”(即戒偷盗、戒妄语、戒乱杀、戒邪淫、戒酗酒),我也虔诚地参加了这一斋戒行列。当时我们这些营以上的军官,绝大多数都由衷相信唐生智、顾伯叙先生所倡导的“自利利人,救人救世,猛勇精进,慈悲喜舍”等宏愿及大无畏精神,相信这是修养军人身心最好的教义。加之,顾先生精通佛学密宗,尤会瑜伽气功,能够飞身腾跃,更使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当时这些很科学的特异气功,被一般无知的人说成是邪术,唐、顾等人因不愿泄露密宗真义,也不肯多加解释,只是潜心修正道,如实知自心。其实,顾先生专心致志于此,对唐生智的具体军政事务并不过问,只是帮唐分析

大局,顺应时势,这对唐生智及我们第四师后来终于进一步倾向革命,参加北伐是起了很大作用的。

1926年初,唐生智在湘南掀起讨吴驱赵运动。3月,赵通电辞职,唐生智到长沙就任代省长。4月,吴佩孚援赵,率军南下,我们在唐生智指挥下奋起抗击,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。6月,唐生智在衡阳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,所属第二、八、九旅及警备旅改为第四、五、六师及教导师,官佐皆上升一级,我也由营长晋升为团长。

7月,我随同第八军全体官兵一道,集体宣誓参加中国国民党。湖南是先有共产党,后有国民党的,国民党省党部的负责人大都是有名的共产党人,如夏曦、郭亮、李维汉、易礼容等。他们都是相信唯物主义的,我们这些军人对三民主义、共产主义都不甚了解。我去问唐生智:“怎么去年入佛,今年又入党?”他说:“佛化党化二位一体,唯心唯物是两极相通的。”我又问:“何以见得?”他说:“国民党讲三民主义,主张‘天下为公’,大同世界;共产党讲‘人类解放我解放’;我们佛教也说‘众生解脱我解脱’,这不都是一致的么?”当时,说得我十分信服。

8月,我随何键师从长沙出发,过岳州后一路疾进。在一次战役中,我带着全团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,冲过城陵矶狭长的新堤,长驱冲入汉阳附近。这时,何键等已策动汉阳守将刘佐龙参加了北伐军,从而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汉阳城和汉阳兵工厂,获得了大量的军械。后来,利用这军械物资,仅第八军就扩大装备了五个军。

9、10月,汉口、武昌相继被我军攻克,我又随唐生智、何键进军鄂西宜章、沙市,肃清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残余势力,并向巴东、秭归方向戒备。

1927年2月,袁祖铭暗中勾结吴佩孚阴谋偷袭长沙,截断北伐后路。周斓奉唐生智密令,在旧历年关摆下鸿门宴,智歼袁祖铭于常德城。此时,我也接到密令,进驻澧州,相机策应,尽歼了袁军残部,解除了北伐军后顾之忧。此役,袁祖铭的警卫团长许克祥倒

戈投诚,被编入何键部下。

1927年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后,何键亦蠢蠢欲动。一日深夜,在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的司令部里,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,决定会后第三天拂晓,将留在武昌的第四军全部解决,并扣押俄国顾问鲍罗廷。当时议定:汉口由李品仙的武汉卫戍司令部负责;武昌由何键负责。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,负责阅马厂地区;当即看好了地形,作了部署。会后,周斓打电话密报唐生智,因此正待按期行动时,唐生智从河南前线拍急电回汉,命令停止执行,并限所有部队于次日集中大智门江岸一带,开往河南驻马店待命,继续北伐到底。

上述几件事情,使我十分佩服唐生智矢志北伐,统一中华的爱国之心;佩服他那除奸务尽,不搞内讧的鲜明爱憎。此时,我虽然已颇具战斗经验,成为能独当一面的第三十五军第三师第八团的团长了,但是,讲老实话,在政治上还是很幼稚的,以致终于在后来迷失了方向。

十年歧途

1927年5月,长沙发生了“马日事变”。反动派“反共驱唐”的阴谋得逞,迫使唐生智“分共”,终于停止北伐。7月,我随军从河南驻马店调回武汉,在汉口广济、武穴一带集中。8月,唐生智坚持东征讨蒋,我又随军开赴九江集中,随即由黄梅、宿松、桐城进入安庆、合肥一带,迫使蒋介石于8月13日宣布下野。

这年11月,李宗仁、谭延闿、程潜又联合起来西征讨唐。我奉命随军撤退。唐生智要求我们在一星期之内,日夜兼程退回湖北忻春。但这时芜湖和安庆已失守,退路已受到威胁,乃绕过崇山峻岭,到忻春集中。由于山路难行,部队疲惫不堪而节节败退。回到武汉的当晚,即听说唐生智已下野,并已东渡日本。这使我感到十分意外,也非常难过。从此,我像失魂似地不知如何是好。

1928年3月,唐生智所部五个军在退到湖南后发生了分化。除三十六军军长刘兴和十七军军长周斓随唐生智一同引退外;第八军李品仙和十三军叶琪投靠了桂系;三十五军何键则为程潜所收容,最后投向了蒋介石的怀抱。我是何键的女婿,自然也只能随何附蒋,还受到蒋介石的礼遇和器重。但在我的内心深处,却一直忘不了唐生智对我的提携培育之情,也忘不了第一个顶头上司刘兴,忘不了良师契友周斓。唐母、周母和我母平日情同姊妹,亲如一家,因而我对唐、刘、周三位就更加眷念。

1928年5月,取唐生智、周斓而代之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,突然被桂系军阀诱至武汉扣押起来,鲁涤平继任省主席。当时,困守湘西的何键与鲁关系不好,蒋介石乃乘机派刘文岛与何键秘密联络,意图去鲁用何。与此同时,桂系为与蒋介石争夺势力范围,亦图争取何键,乃于1929年2月,挟武汉政治分会之权,派李明瑞师偷袭长沙,驱走鲁涤平,迎何键为省主席。何键处于两者之间,左右为难;正在彷徨之际,蒋介石却为稳定局势,顺水推舟,于这年4月正式委定何键就任。何键喜出望外,欣然应命,自此,即在蒋、桂及其他各大派系的夹缝中图存发展,在湖南当了九年之久的省主席。我也以何门长婿、何部主将的身份,走上了歧途。

1929年夏,桂系见何为蒋用,又欲以叶琪取代何键,并从汉口派兵逼近长沙市郊。城内人心惶惶,纷纷逃避。这时,我毫无畏怯,一面维持城内治安,担任最后掩护,将部队安全转移到湘西;一面与蒋介石联络,夹攻进犯之桂军;终于取胜。于是,我部又回到长沙,我也因功被任命为长沙警备司令。四个月后,长沙城内发生特大抢案,在各方面压力下,何键只好将我撤职,叫我仍去做团长,调赴新宁、城步、武岗一带攻剿张云卿。在新宁期间,我做了一件好事:当地国民党县党部为邀功请赏,诬陷该县两个中学校长为“共党”,报请省清乡司令部严惩。我奉命查办。经查证,纯系陷害,乃不予受理。

1929年秋,蒋介石对盘踞武汉的桂系军队实行讨伐,李宗仁

在汉口立足不住,派人见何键,要求通过长、衡退回广西,被何键婉言谢绝;只得由宜昌、沙市经澧州、桃源、溆浦、新宁进入广西。蒋介石密令我部就近堵击,我则认为:政局变化无常,今日是敌,明日是友;今日打垮桂系,明日则要吃掉我军;湘桂终属邻省,唇亡齿寒。于是,我命令所部让开大路,只占领侧面阵地,假意佯攻阻击,实际上等于放鞭炮欢送他们撤回广西。其他各路湘军也效法我,只瞒住了蒋介石一人。后来,湘军整编,四个军改为四个师,军长改当师长,而我却由团长晋升为第十九师第五十七旅旅长。

1930年初,唐生智在河南接管桂系军队后,第二次兴兵反蒋,密邀何键响应,蒋介石亦派刘文岛来笼络何键。我当时极力主张弃蒋就唐,何键却只佯许之,回电唐曰:“如打到武汉,当响应。”另一方面,又向蒋表示“服从中央”。后,唐生智失败,何键安然无恙。我则挨了何键一顿臭骂,说:“要是依你附唐,则同归于尽,死无葬身之地了。”

1930年秋,长沙被红军攻占。这时,我旅正驻扎在广西全州和兴安一带,奉命回师驰援;红军主动退至浏阳后,杀了一个回马枪,向长沙进攻,并在文家市附近歼灭了何军一个旅;我等只好退回长沙城内,固守了一个多月才解围。随即追击红军至江西萍乡。这时,驻在江西的鲁涤平、谭道源等则利用何键的这次挫折,大肆攻讦,欲取何而代之,他们还联络闲居在南京方面的湖南人士叶开鑫、贺贵严等共同反何,指责他搞封建割据,只重用醴陵人,搞“非醴勿用”。何键吓得不亦乐乎,派我到南京疏通各方。蒋介石此时想利用这些矛盾,以湘制湘,因而仍支持何键任湖南主席,并重新整饬湘军部队,撤换了反对何键的三个师长,任命我接任第十九师师长之职,极力维护何派势力。

1930年冬,澧州被湘西红军贺龙部攻占,我奉命前往增援,并指挥陈渠珍师,罗启疆旅等部收复澧州,迫使贺龙红军退往鄂西。蒋介石乃倾全力“围剿”江西红军,任何键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兼西路军总司令,意欲尽驱湘军人赣,为其效力卖命。这时,我向何键

建议,还是要保存本部实力,否则只会落得个“兔死狗烹,鸟尽弓藏”的下场。于是,何键乃留我的十九师为总预备队,滞驻省内,分散在岳阳、蒲圻、衡阳、常德一带,始终不肯入赣“剿共”。两年后,我兼任师党部特派员;移驻平江、浏阳等地,专做后方安抚工作。当时湘鄂边区疫病流行,双方均无战斗。我在后方,接触许多“自新”的共产党,亲身了解到他们之所以屡战不溃的奥秘。于是,也学过他们一些方法,如不准杀人,优待俘虏,保障“自新”人员生命财产等,使安抚工作颇具成效,受到蒋介石的表扬,命我专司此职。这也使我在1931至1933年期间,避免了去江西与红军主力作战,逃避了被歼灭、被击溃的危险。

1933年,湘军大部调往江西后省境空虚、政局不稳,而要新编军队蒋介石又绝不会同意,于是我协助何键将各县地方团队利用起来,以县为单位进行整编,进行集中训练。积少成多,一时竟达到四个师,二十四团的兵力。经费由全省统一征收附加税解决,军事方面由省保安处统一指挥。我兼任了保安处处长。这无形中增加了何键维持湘局的力量。

1934年11月,湘鄂川黔的红二方面军开始突围,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四省边防区“剿匪”总司令。陈诚规定何键所部负责担任以澧州、石门、慈利、大庸、永顺、桑植、保靖、龙山之线的防守,并规定:如果红军从谁的正面地区突破,则该地区的指挥官有失职之责,将严加惩办。其目的是把带兵官撤职,将部队兼并过去,据为己有。此时我正由庐山暑期训练团受训一月归来。刚结业即率军进发湘西。我的十九师的防地又是最长、最容易被突破的。怎么办?于是我请何键将王东原的第十五师摆在常德一带,靠近陈诚的总部;因王东原与陈诚是保定第八期同班同学,私交甚厚,过从甚密,因而情报较灵,能及时掌握红军动态,能帮助我们湘军各部避实就虚。这时,陈诚自己的部队却被红军在大庸、桑植境内消灭了一旅,并在慈利溪口附近,被红军突破了封锁线。而我十九师等何系部队战线长而守备无虞,受到总部嘉奖。于是,我又擢升为第

四路纵队司令，统率第十六、十九、六十三等师继续尾追红军，一直追到云南、昆明，均无差错。在此之前，何键曾被蒋介石撤销了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军职，由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升代。此时，却因我的被擢升而使何键又取得了对这支军队的大部分指挥权。

1935年冬，我的纵队到达昆明后，蒋介石即命令留驻不动，藉以代表中央军控制云南，以达到用杂牌制杂牌的目的。这当然是我们湘军很不情愿的事，我乃以请假省亲为名，回湘请示何键如何处置。时两广酝酿反蒋，与云南也取得了联系。李宗仁、白崇禧派唐希怵来长沙联络何键一同参加，以期共同在西南另创局面；最低限度也希望湖南不要妨碍他们的行动。何键正感军队远处边陲，受人所制，亦思有所活动，乃征询我的意见。我说：“老蒋该反。但唐生智都反不倒他，两广又有何能耐？要他们搞出一定规模，我们才好表示态度。”何键深以为然，乃派我以回防云南为幌子，顺道去桂林一探虚实。于是，我于回长沙后第三日，即乘自备汽车前往广西。李、白派人迎至黄沙河；我又乘专机经柳州到南宁，向白崇禧转交了何键的亲笔信。李、白决定派李品仙、唐希怵陪我再次同机返湘，与何键再作进一步商谈。而何键乃一面派我与之周旋；一面通过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向蒋介石告密。不久，两广事变终于被蒋介石解决，我周旋于两者之间的事也被老蒋发觉。一天，蒋命顾祝同转知我到广州去，我十分惊慌，不知所措。幸亏何键在蒋介石左右极力疏通，终于逢凶化吉；不但未加斥责，而且说我迷敌有功；并在广州受到蒋介石的亲自召见。尤感意外的是：还获准将部队调出云南。不过，不是回归湘省，而是开赴江浙。从此，湘军正式脱离了何键的节制，而由刘建绪直接指挥，军队的命运则全由蒋介石来亲自主宰了。

八年抗战

1936年10月，我部奉调从云南到达浙江嘉兴、建德、桐庐

一带待命。这时，经过三次反蒋后的唐生智重新参政，担任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，专门筹划抗日准备工作，在京沪一带负责督修三道防线。我有机会常和他见面，在他的影响下，主动参加为抗日救国的献机典礼。但这时的蒋介石却主张求和，强调所谓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并与日本人签订了“何梅协定”。

12月，西安事变发生，全国抗日情绪进一步高涨；蒋介石从西安回南京后，背信弃义，扣留张学良，仍想坚持内战，令我担任闽赣边区绥靖区指挥，在浙东围攻红军刘英的部队。但我不再俯首听命了，只在温州一带与刘部相持了九个多月，并无战事。蒋介石鉴于人心、军心对他不利，为统一高级军官思想，又一次在庐山举办暑训团，我再次参加“受训”，并担任教育组将官队连长。受训期间，我们在训练总监唐生智的带动下，整日的话题都是抗战、抗战。大家一致认为：国家已经到了不战则危，不战则亡的紧急关头了。

1937年7月，卢沟桥事变发生，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。我立即奉调回防，离开暑训团，到温州与刘英所部取得了联络；从此，双方消除隔阂，一致抗日。旋即率部到宁波集中，担任镇海一带的防卫工作。此时，我被任命为第七十军军长，但实际兵力仍只十九师一个师，仍由我兼任该师师长。

8月，上海保卫战打响了，我师是参战者之一。不久，我在北伐时期结交的老朋友马子谷来部工作。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，后来又脱党，此时仍与地下党有联系，是经有关方面介绍来与我合作的。我们合作得很好，我们部队在前方浴血奋战，马子谷则在上海市发动人民慰劳我们，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的斗志。马子谷还介绍潘汉年、梅正彬、郭沫若等人和我认识，并介绍一些进步人士来我部工作。他们都是全力支持部队抗日的，我表示竭诚欢迎，并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；因此，十九师在上海抗战中打得很好、很壮烈，是参战的58个师当中战绩最佳的10个师之一。全师伤亡也极其惨重，一个团全被打完了，才奉命撤出阵

地，退至浙江东阳一带补训。这时，当局才将一二八师拨入我七十军的建制。

1938年5月，蒋介石令七十军的两个师集结金华，然后车运武汉，参加武汉保卫战。6月初，又由武汉开赴麻城、英山、罗田一带赶筑工事；7月，又急调十九师驻防九江，重新构筑新的防线，一二八师则在九江东西两侧布防。此时，梅正彬先生介绍共产党人陈希周来我部工作，同来的还有朱江户、许德瑗等一大批爱国青年。我令他们到湖南长沙成立七十军干训班，因为大战临近了，我估计又将有大量伤亡，亟需加速培训后备军官力量，才能坚持长期作战。这时我已作好了长期与敌寇周旋到底的思想准备。

7月下旬，日寇中支派遣军畑俊六大将的一〇六师团向我部防地进犯。他们凭借海空军绝对优势，一举攻陷了湖口，随即疯狂轰炸九江，原已筑好的防地，赶赴庐山以北马祖山，阻击登陆之敌，以掩护集团军主力转移。我率部连夜赶去，抢占阵地，英勇阻击了七天七夜，始终未让已经登陆的敌寇部队前进一步，同时迫使敌军登陆的炮兵在狭窄的稻田里施展不开，从而保障了慌乱不堪的各路友军主力陆续撤离。

与此同时，我还命令十九师派出部队支援一二八师完成阻击任务。因为一二八师原系湘西陈渠珍的土著部队，素质差，武器差，师长顾家齐缺乏作战经验，一遇伤亡即溃散后退，以致被敌包围。该师向我军部求援，我立即派出一个营的兵力，将他们救出重围。事后，陈诚趁机将顾师长撤职查办，一二八师的番号也随即被撤销。这本是他们利用抗日消除异己部队的一贯手法。不仅如此，陈诚还将其嫡系部队预备第九师张言传部，拨归我的七十军建制，其用意并不在补充我这支杂牌军，而是为了日后取我而代之，让张言传担任七十军军长，把我这支部队连根儿拿过去。

7月底，敌一〇六师团主力在空军掩护下，沿南浔线南下，